

海陸爭霸下亞太戰略形勢發展與 臺灣的安全戰略

李文志*

- 一、前言
- 二、地緣政治中海陸爭霸的戰略觀
- 三、亞太地區海陸爭霸戰略形勢的發展
- 四、亞太地區潛在軍事衝突的發展與挑戰
- 五、臺灣的亞太安全戰略—代結語

本文主要是從地緣政治的海陸爭霸觀點，論述從大航海年代以來全球戰略發展的基本型態；其中，亞太地區因特殊的地緣結構與歷史經歷，更形突顯海陸強權爭霸對亞太戰略形勢發展的關鍵性影響。文中的討論焦點與時程，則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太地區海陸強權攻防與權力體系發展間的關係；特別是，分析從美、蘇與中（共）三角關係到美、中（共）雙邊關係，如何影響亞太地緣戰略的發展。美國在亞太的地緣戰略，除透過整合亞太地區海洋國家的聯盟關係，在亞洲陸地邊圍形成一可進可守的海洋戰略線—扇形戰略外；更企圖分化亞洲大陸上蘇、中（共）兩大陸上強權的關係。相對地，在亞洲大陸上，蘇聯與中共雖曾在冷戰時因各自的戰略考量而對立；但冷戰後因經濟與整體國力的消長，中共基本上已取代俄羅斯成為亞洲大陸上的主要強權，而且，中（共）、俄間更儼然形成統一戰線與美國進行戰略抗衡的態勢。冷戰後的亞太戰略形勢就在美、中（共）間的戰略部署中開展，而夾處在兩大海陸強權間的亞太國家則因各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助理教授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01年5月3-4日「2001年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主辦單位：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本文要特別感謝兩位審查者的寶貴意見；其中，有關未來寫作方向的建議更將是作者未來努力的重點，謹此致謝。

東吳政治學報/2001/第十三期/頁 129-174

自的利害不同而歸屬其中一方，或遊走於兩邊以獲取最大的利益；當然，亞太地區主要的安全問題－朝鮮半島、臺灣海峽與南中國海爭議的解決，也深受兩大強權戰略的制約與影響。對位處亞太海陸爭霸戰略鋒線上的臺灣，則必須善用本身特殊的「中介」優勢，才能達成以發展來擴展生存的戰略。

關鍵字：地緣政治、海權論、心臟地帶論、邊緣地帶論、扇形戰略、交往政策、弓箭（T）形發展戰略、三個三角戰略、朝鮮半島、臺灣海峽、南中國海、地緣經濟、中介位置

人類文明醞釀於陸上的大河之濱，發展於各大海洋波瀾交匯之處。從古代的地中海文明、近代的大西洋文明到當代新興的太平洋文明，一再彰顯人類歷史的進程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與接觸而逐步跨越大海的限制，將全球各陸地逐一得整合進入一個互賴日深但競爭也愈趨激烈的世界中。人類世界中的競爭、衝突與戰爭即一再爆發於海陸文明的交接處，特別是，當西方的海洋文明亟欲將全球各洲的大陸文明納入資本主義體系的大航海年代，殘酷的戰爭更讓腥羶的人類史令人不忍卒睹。事實上，從各族文明發展、全球地緣結構與資本主義演進的歷程看來，近代的人類歷史可以說就是一部海陸爭霸史。亞洲大陸濱太平洋地區—亞太，從十七世紀起就被激烈地整併—壓縮進全球資本主義的競爭體系，歷經四百年這一劇烈的資本主義板塊活動依然未曾稍息。代表資本主義主流的西方海洋文明，尤其是當代新興海洋霸權的美國更希望將歐亞大陸納入其掌控勢力，逐步完成將世界資本主義—美國化的霸權意圖。中國大陸則是當前亞洲陸地上唯一在地理規模與國力基礎有條件和美國競逐區域霸權的國家。進入二十一世紀，亞太地區的戰略形勢將開展於美、中海陸勢力的爭霸中；而臺灣在亞太地區的生存與發展，也將繫於其如何善乘兩大勢力的競爭、衝突與合作。

一、前言

進入一九九〇年代，亞太區域安全問題繼經濟合作之後，成為亞太各國另一個關注的焦點。在後冷戰時代全球性和解的氣氛下，亞太區域安全問題雖較冷戰時代更有機會和條件經由公開與和平的方法，尋求可能的解決途徑與模式。然而，亞太地區卻因獨特的地緣政治結構、戰略形勢與重新整編中的權力結構，而使區域安全問題的解決仍面臨諸多的困難與挑戰。尤其是在冷戰結束後，以往美、蘇集團在亞太進行圍堵與反圍堵的攻防因區域新權力平衡的形成，導致過去被鑲鉗在美、蘇兩極體系而相對穩定的安全課題，隨著全球及區域內利害關係的改變而隱現不安的發展；其中，又以朝鮮半島、臺灣海峽與南中國海等地所潛藏的安全難題最具爭議及爆炸性。

從亞太地緣政治的戰略態勢看來，冷戰後亞太地區主要存在著兩股勢力的爭霸與競合：一是以美國及日本為首的海洋勢力；另一則是取代俄羅斯成為東亞陸塊新興霸權的中共。兩者的戰略佈局與攻防深深地影響亞太戰略形

勢發展及安全問題的解決。至於其他的亞太國家則在不同的時空情境中，因各自利益的考量而分別歸屬或遊走於兩大勢力間，讓兩大勢力企圖構築的亞太統一戰線經常重疊而糾結不清。這使得亞太戰略形勢的發展與區域安全問題的解決，因海陸勢力激烈競逐亞太版圖而更趨複雜及難以處理。當然，這些遊走於海陸勢力的國家也具有緩衝兩大勢力直接衝撞的功能，而在區域的權力爭霸戰中扮演動態平衡的角色。

整體而言，後冷戰時代亞太戰略形勢與安全問題的發展與挑戰，可從下列兩個層面來掌握：一是從地緣政治的視野，綜觀亞太地區海陸爭霸戰略形勢的現況與發展趨勢；二是透過海陸爭霸的戰略解析，廓清亞太區域內主要安全問題的運作與挑戰。此外，對亟於突破外交限制以尋求安全空間的臺灣而言，精確掌握亞太戰略與安全體系的走向與內涵，將是臺灣在總體層次架構安全戰略的準據，也是藉以融入亞太安全體系發展確保國家生存與發展的依憑。

本文的目的即試圖釐清和掌握亞太戰略形勢的發展，藉以思考及提出臺灣的亞太安全戰略。因此，本文的討論將分成四個部份：一是分析地緣政治中海陸勢力的佈局對全球與亞太戰略形勢發展的意義與影響；二是透過美國與中共在亞太進行戰略攻防的鋪陳，呈現亞太海陸爭霸戰略形勢發展的意義；三是從海陸爭霸的戰略結構中，掌握在亞太新權力平衡形成過程中最有可能引爆衝突的區域安全問題，包括朝鮮半島、臺灣海峽與南中國海可能的衝突與影響；四是提出臺灣在亞太海陸爭霸的特殊戰略態勢下，應有的區域安全戰略觀。

二、地緣政治中海陸爭霸的戰略觀

地緣政治是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重要論述，主要在探討空間關係與權力結構在歷史過程中的演變。（Sloan, 1988: 2-5）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西方列強在爭霸世界的過程中曾提倡各種地緣政治的戰略，他

們從全球的層次綜觀地理空間與稱霸世界的關係，分析強國應如何善用地緣位置的相對優勢部署爭霸世界的戰略動線與進程。揭櫫這種謀略的代表者包括美國馬漢(Alfred T. Mahan)的「海權論」(Sea Power)、史匹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邊緣地帶論」(Rimland)與英國麥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論」(Heartland)。他們思辯的焦點主要在強國究竟是透過海洋還是大陸才能稱霸世界，而他們的主張也確曾影響美國、德國與蘇聯的戰略佈局，對二十世紀的國際局勢，特別是對二次世界大戰後圍堵與反圍堵的冷戰形勢產生深遠的影響。直至今日，海陸爭霸的地緣戰略仍是美國構思歐亞大陸戰略的參考架構；(Brzezinski, 1997: 3-9)當然，也是歐亞大陸新興強權－中共跨越以美國為首之海洋勢力圍堵以逐霸亞太的輿圖。

2.1 海權論

曾任美國海軍大學校長的馬漢，是第一位有系統詮釋海陸權力特質不同，並極力倡導掌握海權重要性的論者。(Parker, 1998: 97)馬漢藉由研究海洋的發展史，特別是十八世紀英國霸權如何擴張全球版圖的戰略，而主張提升海洋權力對晉身為強國至為重要；尤其是，能否掌握重要的出海口和交通航線更是逐霸全球的關鍵。(馬漢, 1996)馬漢進一步以戰略的觀點認為，海洋是同時具有商業利益與軍事安全的價值，強權為能拓展商業航運的利益必須取得海上航行的自由，而為取得航行的自由就必須有強大的海軍力量掌控制海權。馬漢不僅著述海權論更大力推動美國成為海權大國，並直接參與美國與西班牙的海戰；而且，其觀點還影響美國介入巴拿馬獨立戰爭以取得興建及營運巴拿馬運河的特權，讓美國得以利用最短的航線將大西洋與太平洋連接起來，完整地構築美國的海洋防衛線－將戰火隔離於美國本土的「離岸戰略」(Off-shore Strategy)，並進一步奠定稱霸海洋的基礎。

在海權思想的影響下，美國在西進太平洋與東跨大西洋的戰略動線上，美國選擇先西進整體國力明顯處於弱勢的太平洋彼岸。美國於一八九八年合

併夏威夷，接著策動古巴獨立並以觀達那港作為海軍基地，以及取得波多黎各而控制加勒比海，再從加勒比海經巴拿馬運河進入太平洋，然後沿途經夏威夷、中途島、威克島、關島到殖民菲律賓，掌控橫互太平洋的西進海上航行權。（許介麟，1991：6）當然，從亞太地緣戰略的觀點而言，美國掌控菲律賓也意謂美國掐住從日本到印支半島、南中國海航線的咽喉，以及取得從海面上前進亞洲大陸的重要橋頭堡。而且，美國將橫互太平洋的西進航線與掌控從日本到南中國海的縱向航線架接的 T 形海洋戰略，就是美國在二次大戰期間介入亞太之「跳島戰略」，以及冷戰時代的「列島戰略」與後冷戰時代「扇形戰略」的原形。

2.2 陸權論－「心臟地帶」論

英國地理學者麥金德從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歷史性衝突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隨著世界權力結構的轉變將從海權邁入陸權時代，陸權的爭奪將成為強國稱霸世界的關鍵。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一書中，麥金德指出從東歐平原延伸到西伯利亞平原的大陸「心臟地帶」是世界政治的中樞地帶，這一內陸區域是海洋國家軍艦無法到達，是不受海洋國家勢力控制的地區，更是陸地國家爭霸歐亞大陸的戰略中心區。順此推論，麥金德在地緣政治上提出其著名的戰略進程：誰統治了東歐，就能支配心臟地帶；誰支配歐亞大陸的心臟，就能控制歐亞大陸所在的世界島（歐、亞、非陸塊）；誰控制世界島，就能稱霸全世界。（沈默，1979：19-20）

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時空背景來看，麥金德倡議「心臟地帶」論的動機顯然有三：一是反映十九世紀中期後英國國力的衰退，依靠海權稱霸世界近百年的日不落國，在長期與法國爭奪海外殖民地後，面對新興的強權特別是德國與美國，已漸感失去對世界的支配權；二是憂心歐陸的新興強權－德國將破壞歐陸既有的權力平衡，進而威脅國力已趨衰退而一海之隔的英國，而這正是英國身為緊鄰歐陸之海洋國家在地緣政治上的宿命；三是希

望同為實行民主政體且為同族的新興海洋強權－美國，能與英國共同介入歐陸政治防範德國破壞權力的平衡，當然，此舉也可分散美國國力於歐陸政治上，避免美國的海權力量擴張過速而取代英國在世界的地位，以確保英鎊集團的勢力與幣值。

麥金德「心臟地帶」論的主要目的雖為防止德國的興起，但首先落實此論者卻是德國。任職德國外交顧問的地緣政治學者 Karl Haushofer 即依據「心臟地帶」論，慫恿希特勒採取擴張政策，從侵略東歐的波蘭與捷克開始來建構德國人「生存空間」的第二「泛區」（panregions）－涵蓋歐洲及非洲的區域，再從第二泛區逐步統一世界。（Taylor, 1993: 57-58）德國此舉終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然而，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在戰時也依據麥金德的「心臟地帶」論進行佈局，並在戰後立即佔領東歐組成蘇聯共產集團，企圖先控制歐陸進而掌握歐亞大陸。面對二次大戰後歐陸地緣政治的變化，取代英國成為新興海洋霸權的美國，也在麥金德「陸權論」戰略觀的影響下，絕不允許歐亞大陸上出現一個稱霸歐亞的強權。美國這一冷戰時代的地緣戰略設計延續至後冷戰時代依然未變；當然，「陸權論」也成為歐亞大陸強權拉大戰略縱深，藉以和海洋強權爭霸世界的重要思考架構。

2.3 海陸爭霸－邊緣地帶論

荷蘭裔的美國人史匹克曼從海陸勢力的交鋒處切入，提出在海洋與陸地交界的「邊緣地帶」－即介於歐亞大陸「心臟地帶」與周邊沿海島國及海上航線中間的新月形區域上，才是攸關強權能否爭霸世界與維持世界穩定的關鍵區域。史匹克曼認為麥金德所指稱的「心臟地帶」，因為雨量少、人口少、天氣冷、沙漠多且不易開發，故其重要性遠不如人口、產業集中、文明發達且適合開發的「邊緣地帶」。（許介麟，1991：9-10）史匹克曼不贊成麥金德的觀點，他認為海權和陸權國家若能有效聯合，防止企圖控制「邊緣地帶」的國家得逞，便可在海陸勢力的平衡中維持世界秩序的穩定。因此，他將麥

金德的地緣戰略進程改寫成：誰統治「邊緣地帶」，就能統治歐亞大陸；誰統治歐亞大陸，就能控制世界的命運（Fifield & Percy, 1944: 14）從海陸爭霸的觀點而言，「邊緣地帶」不僅是海陸強權衝突的緩衝地帶，更是關鍵海陸勢力消長的交鋒區域。史匹克曼據此主張美國絕不能讓任何一個強權統一「邊緣地帶」，該區域的權力歸屬最好是由美國自己來掌控才能確保美國的利益。

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決定其將採取的地緣戰略。史匹克曼認為美英等海洋國家的國力並不足以抗衡歐亞大陸上強權的聯合，美國必須設法在歐亞大陸上維持強權間的權力平衡，避免出現單一的霸權或聯合的勢力。他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位居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兩端的德日聯盟若真取得勝利，歐亞大陸將出現一獨大的勢力。美國除別無選擇地須與英國結盟外，還須聯合處於歐亞大陸內陸區域之俄羅斯及中國的陸權力量，才能在迫使德日聯盟須同時投入海陸戰場而將之挫敗。史匹克曼從二次世界大戰中歸結，美國的主要威脅最有可能來自於歐亞陸上反美勢力的聯合；而且，野心勃勃的俄羅斯遲早會是美國安全的最主要威脅，因為就地緣戰略的觀點，一個從烏拉山到北海的俄羅斯和從北海到烏拉山的德意志，對美國戰略威脅的意義是一樣的。在二次大戰期間，他就曾建議美國不要摧毀德國和日本而只須撤換當時的政權，因為，往後若有其他強國企圖在歐亞大陸稱霸時，「邊緣地帶」兩端的德、日將可發揮重要的制衡功能。

史匹克曼的論點深深影響美國二次大戰後最重要戰略設計者－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戰略觀，其依據「邊緣地帶」論提出「圍堵政策」（Containment Policy），主張美國應聯合海洋民主國家在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構築圍堵大陸共產勢力外侵的戰線。（Kennan, 1947）海洋民主－資本主義勢力與歐亞大陸共產極權勢力沿著「邊緣地帶」對峙的戰略形勢，成為支配二次大戰後世界局勢發展的主軸。海洋與大陸勢力都企圖掌控進而跨越「邊緣地帶」，將勢力深入對方的戰略核心區域從而稱霸世界。直至今日，從「邊緣地帶」論衍生的海陸爭霸仍是美國全球戰略佈局的依據，以英國一

西歐及日本爲主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美日新安保條約，就是美國牽制歐亞大陸局勢發展的地緣憑藉。另外，由韓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則是企圖從種族、宗教與文化層次再強化美國與西歐各國，甚至是美國與俄羅斯在文明與地緣政治上的統一戰線，藉以分化歐亞大陸上的陸權勢力，尤其是俄羅斯與中共潛在聯盟的關係。（李文志，1999）無疑，對中共及俄羅斯而言，如何鞏固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團結，再伺機掌控「邊緣地帶」就成爲其抗衡海洋勢力的戰略棋局。

三、亞太地區海陸爭霸戰略形勢的發展

亞太地區因海洋（太平洋邊緣國家）與陸地（亞洲陸塊國家）相對的地緣特徵，以及這兩大地理區域自二次世界大戰後分採不同的政經體制與發展策略，導致亞太地區自韓戰以來就呈現海洋（美、日爲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陸地（蘇聯、中共爲主的社會主義國家）兩大區域的戰略對峙關係。從冷戰以來，海洋與陸地勢力互爭霸權的攻防幾乎就是發動亞太局勢的軸心；進入後冷戰時代，亞太的戰略態勢基本上仍延續著海洋與大陸勢力爭霸的格局。所謂海洋勢力，主要是美、日、澳、紐、加等依海洋維生且求發展的經濟先進國家；而所謂大陸勢力，主要的代表是中共及昔日蘇聯的俄羅斯等位於歐亞陸塊的國家。此外，兩大勢力間還存在著擺盪於中間的南韓和東協諸國，這些國家經常須在海陸逐霸中求取平衡，或採取中立、不結盟的立場；只是，它們不可避免地仍因更靠海洋或更靠大陸，而多少有較偏向海洋或大陸勢力的傾向。這種海陸爭霸的現象，不僅開展於海陸兩強的戰略的部署與攻防中，也見諸於亞太地區主要的潛在軍事衝突問題上，特別是朝鮮半島、臺灣海峽與南中國海等地。

3.1 以美國爲首海洋勢力的佈局

美國自十九世紀下半葉馬漢提出「海權論」後，如何揮軍西進太平洋就成爲美國建構全球霸權的重要進程。第二次世界大開啓美國掌控太平洋的戰略契機。美國分從亞洲陸地與陸地邊緣的海島鏈兩條戰略動線介入東亞戰事，企圖從戰時到戰後全面控制東亞局勢的發展。（李文志，1989）在亞洲陸地上，美國希望扶持中國成爲戰後東亞的強權，以牽制戰時即不斷擴大勢力的蘇俄共產主義，並在戰後取得主導中國龐大市場的地位；在海島鏈上，美國透過跳島反攻的戰略方式，逐步掌握串聯亞洲陸地邊緣國家的籌碼，在亞洲陸地周圍建立可進可退的海洋戰略線，此即爲著名「列島戰略」（*Insular Strategy*）的前身。然而，美國的戰略構想卻因中共取得中國政權而遭破壞，迫使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將「杜魯門主義」擴大適用於東亞地區，確立以「列島戰略」－聯合日本、南韓、臺灣與東南亞海島國家串成的海洋圍堵線，圍堵亞洲陸地的共產主義勢力向海洋國家擴張。

美國從一九五〇到六〇年代的亞太戰略，就是在海洋與陸地對峙的地緣政治中，透過雙邊安全協定與經濟援助的方式，將美國與亞太盟邦的政經利益整合成以美國爲首的區域安全體系。然而，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後，美國的海洋圍堵戰略線因蘇聯的擴大建軍政策及積極介入東南亞戰事而鬆動，這意味蘇聯即將突破美國在亞太設置的海洋圍堵戰線，甚而有可能跨出歐亞大陸威脅美國本土的安全。美國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總統上任後，即藉撤出越南與聯合中共以制蘇聯的兩大政策，因應對美國漸趨不利的亞太戰略形勢。尼克森一方面在一九六九年七月宣佈「關島主義」，表明美國將自亞太撤軍及亞太國家應強化自身的防衛責任；另一方面，尼克森則利用中共與蘇聯在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邊界衝突的機會拉攏中共，達成其聯合中共牽制蘇聯的戰略目標。（*Sutter, 1991*）就亞太戰略形勢的發展而言，美國聯中共制蘇的意義是：亞太地區的海洋防衛線，特別是臺灣的戰略地位，將隨著美國拉攏中共而下降；相對地，中共的戰略地位則隨之上升，埋下臺灣外交往後處於

困境的結構性因素。當然，美國也終於達成其自二次大戰時就希望「擁抱」中國的戰略企圖。

進入一九七〇年代，美國的亞太戰略不僅延續聯中共以制蘇聯的陣勢，而且，繼尼克森與福特總統上任的卡特總統，更有意深化美蘇在亞太地區的和解，使其更形依賴中共在牽制蘇聯與維持亞太區域穩定的角色。不過，卡特政府採行的和解政策因一九七九年蘇聯入侵阿富汗與中、越共爆發戰爭而改變。首先，蘇聯在取得衣索比亞而控制紅海南端入口後，又於一九七八年入侵南葉門，大幅擴張蘇聯在中東石油地區的勢力，稍後，伊朗親美國的巴勒維政權也在一九七九年垮臺。這讓阿富汗成爲蘇聯能否從西到東包抄阿拉伯半島的關鍵，因此，蘇聯入侵阿富汗終於迫使卡特政府放棄深化和解的戰略，重新對蘇聯採取強硬的政策。其次，中共在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中因飽受國防武力殘破之苦，而使其急迫地想藉現代化來增強國力。（Gregor, 1988: 7-9）中共從一九八〇年起就希望降低與蘇聯之間的緊張關係，以減少其進行現代化的成本，並在一九八二年改採「戰略獨立」的外交路線，也就是放棄聯合美國牽制蘇聯的戰略。

一九八一年上任的雷根總統除採更強硬對蘇政策外，也因蘇聯取得越南金蘭灣的海軍基地及中共有意緩和與蘇聯的對峙關係，逼使美國重新審視聯中制蘇的戰略以因應新的亞太形勢。從一九八一年到八二年間，雷根政府內部即因此爆發兩大陣營的激烈辯論：一是以國務卿海格（A. Haig）爲主，堅持美國應持續聯中制蘇的政策；二是以國防部長溫柏格（C. Weinberger）爲代表，主張美國須改以美日安保條約爲亞太防衛的主軸。結果，在中共決定採取獨立外交路線後，新任的國務卿舒茲（G. Schultz）採用溫柏格的戰略主張。美國於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在亞太部署的「海洋戰略線」又再度成爲美國推動亞太戰略的主軸，而支撐此一海洋戰略三大支柱的長程軍力部署、海外前進基地與雙邊安全協定，又成爲美國自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後在強化亞太軍事部署的重點。然而，在美國積極以美日安全同盟串聯海洋戰略線的同時，新上任的戈巴契夫除在一九八六年七月的海參崴演講中，宣稱蘇聯也是太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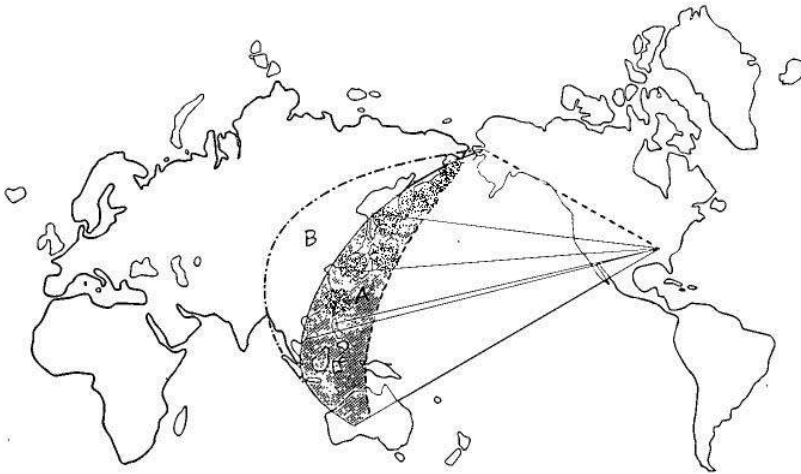
洋國家外，也將蘇聯在亞太的潛在敵人，由華盛頓—東京—北京的聯盟關係改爲華盛頓—東京—漢城的三角關係。蘇聯此舉顯然有意藉由與中共的和解，牽制美國串聯亞太海洋戰略線佈局；當然，對中共而言，以美日爲首之海洋聯盟關係的強化對其國家安全也是一大威脅。在一九八八年九月蘇、中共領袖互訪的聯合聲明中，雙方即表明美、日組成的軍事聯盟是彼此潛在的軍事敵人。美、蘇、中三方在一九八〇年代後期的戰略攻防，再次突顯亞太地區獨特的海洋與陸地爭霸的戰略態勢。

中共對於美國戰略的重要性，因美、蘇冷戰體系的逐步解體而日漸降低。美、蘇在一九八九年二月「馬爾他高峰會」中，正式宣告雙方關係的全面和解，連帶促成亞太地區柬埔寨與南、北韓等問題的漸次鬆解。冷戰的結束使得中共牽制蘇聯的戰略價值幾近蕩然，而且，中共更因「六四事件」、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堅持及蘇聯的解體，反而使其隨著冷戰後區域安全問題的突顯，取代蘇聯—俄羅斯成爲美國在亞太政軍利益首要的競逐者。(Bush, 1991b) 換言之，冷戰時代「中共—陸地」與「海洋戰略線」在美國亞太戰略中的替代關係，隨著冷戰的結束而爲「海洋戰略線」所取代。更何況，這些海洋國家又多與美國訂有雙邊安全協定，並享有大量的對美貿易順差，尤其是日本。因此，美國勢必設法確保和這些海洋國家的軍經關係，以求持續掌控亞太政經發展的走向。從海陸爭霸的地緣政治觀點來看，美國企圖將安全保障與經濟利益結合並體現於「海洋戰略線」的亞太戰略，必將遭遇來自亞洲大陸國家的挑戰；尤其是，中共與俄羅斯勢必積極串連，反制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所亟欲建構「一超多強」的國際體系。

承襲海陸爭霸的戰略格局，布希(George Bush)政府的國務卿貝克(James III Baker)在一九九一年十月發表〈美國在亞洲—浮現中的太平洋區域架構〉一文。(Baker, 1991) 該文總結美國的亞太戰略就是：以美國(及亞太各國的共同經濟利益)爲中心所輻射出去，從日本—南韓—菲律賓—泰國—澳洲等海洋國家所構成之弧形的「扇形戰略」(fan-spread)可參考圖一由「實線」所構成的圖形。相對於中共等陸地社會主義國家，布希政府「扇形戰略」

的「扇沿」—亞大海洋戰略線上構成的帶狀區域，就成爲向其推動「和平演變」的「新（軟）圍堵線」。稍後，布希總統在啓程前往亞太地區訪問前夕，即明確指出冷戰結束後，美國的中國政策就是積極與中共交往以使其產生良性的變化，也就是假「建設性的交往」（constructive engagement）「和平演變」中共，讓其成爲實行市場民主體制的國家。

圖一、美國「扇形」亞太戰略示意圖（作者自繪）



「新太平洋共同體」（A New Pacific Community）是柯林頓政府上台後的亞太戰略。（Lord, 1993；Clinton, 1993）基本上，此一戰略包含兩大部分：一是在全球性「擴展」（enlargement）戰略的前提下，在亞太地區達成拓展「經濟安全」、推廣人權外交和確保區域「權力平衡」三大利益；二在亞太既有的戰略格局中，跨越地緣限制將美國勢力擴展至亞洲大陸。從美國亞太政策的傳統看來，柯林頓政府將經濟、政治與安全利益整合於一體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是企圖跨越冷戰時美國在亞太海洋國家間所建構之海洋戰略線，將美國勢力進一步「擴展」至亞洲大陸。而就歷史與地緣戰略的進程而言，柯林頓政府企圖將美國勢力擴展於亞洲大陸的戰略目標，就是希望將美國在亞太的勢力版圖，從圖一中的 A（海洋）部分擴大爲 B（大陸）部分；

果真如此，美國將達成自馬漢海權論後就亟欲「西進」太平洋，將太平洋納為美國內海的歷史性企圖。

在美國所建構從海洋擴展至陸地的亞太戰略中，美、日關係一直是推動該戰略最重要的軸心。柯林頓政府上任初期，美國內部雖曾因究竟應以經濟（修正主義論）或安全（戰略平行論）的利益界定美、日關係而出現激烈的爭議（參見 *Foreign Affairs* 74 (4), 1995: 90-114）；但在一九九五年的「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ic Report, EASR, 1995*），即「奈伊報告」（*the Nye Report*）中採行「戰略平行論」觀點，確立美日安保體制是美國亞太安全戰略中最重要組成後，由美、日聯盟所串聯—主導的海洋戰略線即為美國在冷戰後逐鹿亞洲大陸的最主要憑藉。美、日雙方也旋即於一九九六年三月的台灣海峽危機後，在柯林頓總統四月中旬的訪日行程中簽下新的安保宣言—「美日安全聯合宣言：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根據美日新安保宣言修正的「一九九七年美日防衛合作指南」（*the U.S.—Japan Guidelines for Defense Cooperation of 1997*）中，對亞太安全體系影響最大也最具爭議性的內容是對日本「周邊事態」的因應。雖然，有關美日新安保宣言的文獻中並未明指「周邊」的內涵，但依據一九六〇年安保條約中的「遠東條款」及一九八三年日本將自衛隊巡防海域擴大至一千海浬的歷史，所謂「周邊」的範圍至少涵蓋菲律賓以北的臺灣與南韓；而且，從駐日美軍實際部署與巡弋的範圍來看，「周邊」的範圍更可擴至整個東南亞地區，甚至可和澳洲的防衛體系聯成一氣，而這正是美國在冷戰結束之際針對以中共為主之亞洲陸地國家所構築的「扇形戰略」體系。事實上，中共也認為美日新安保宣言就是針對中共而來，所謂的「周邊」就是包括臺灣在內的中國沿太平洋海域，換言之，這根本就是具體落實布希政府時期針對中共所設下的「新（軟）圍堵線」。

美國在一九九八年公佈的「東亞戰略報告」（*EASR, 1998*）—又稱「坎貝爾報告」（*the Campbell Report*）中的主要架構及內容幾乎都延續一九九五年的「奈伊報告」，內容除確認美國東亞戰略的主要基石即為與五個（海洋）盟國的防衛關係外；更重要的是，該報告竟完全未提及美國在數月前才剛和

中共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the construct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只表明將基於合作與互利的關係「全面與中共交往」(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with China)。當然，依據「擴展」戰略及「奈伊報告」的精神，「全面交往」的目的就是將中共納入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內，即和平演變中共政權，而支撐「交往」—前進亞洲陸地的橋頭堡就是美國在亞太灑下的海洋戰略線。換言之，美國不論對中共採取「交往」或「圍堵」的戰略，以美日安保體制為主體的海洋戰略線都是美國確保亞太海權的重要支柱。

事實上，美國歷經多年的論辯，不論是主張對中共採取「交往」或「圍堵」，抑或是所謂的「藍幫」或「紅幫」之爭，美國對中共的戰略已逐漸發展出以海洋戰略線為基石，對中共既「圍堵」又「交往」的「第三條路線」(the third way)—「圍交」(congagement)策略。(Rand, 2000)此外，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推動部署「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的同時，美國國防部在 2000 年提出的兩份重要報告—「整合性願景二〇二〇」及「亞洲二〇二五」中，更建議美國政府為因應中共的崛起，應將全球戰略重心從「歐洲中心主義」轉變為「亞洲中心主義」，而且必須慎謀應付中共軍事大國化的對策。(石碇, 2000b)進入新世紀，中共已是美國在亞太甚至是全球最重要的假想敵。繼柯林頓上臺的小布希總統，在其主要國家戰略智囊萊斯(Condoleezza Rice)主張美國應強勢地增進國家利益後，(Rice, 2000)也以「戰略競爭」取代「戰略夥伴」重新界定美、中的關係；而美、中在南中國海上方軍機擦撞事件中所衍生的後續互動，的確也透露著雙方日益增高的競爭態勢。此外，美國為能提升與中共的戰略競爭態勢，也試圖尋求增強與印度的合作關係，以便在中共後方的亞洲陸塊上建立牽制中共及中亞情勢發展的前進障地。當然，對印度而言，拉攏美國勢力除可平衡日益強大的中共，還能藉此增加與俄羅斯折衝的空間以免中、俄間過於密切關係對其增加的地緣壓力；更何況，印度還可因此而獲得美國的戰略默契，讓其勢力東進至南中國海—亞太地區，一方面牽制中共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力量，另一方面，則可與亞太海洋經濟發展帶結合，而有助於印度經濟的發展—

尤其是，印度龐大的資訊軟體產業正可和以資訊硬體製造業為主的亞太各國互蒙其利。

綜觀歷史，美國從十九世紀末開展「海權論」戰略到二十世紀末稱霸全球（Pax Americana），美國的亞太戰略就是徹底掌控亞太地區的海陸世界；然而，亞洲大陸卻從未被美國真正地掌控過。基本上，在冷戰結束後「一超多強」的世界局勢下，美國有很好的機會實現其百餘年來企圖支配亞洲大陸讓太平洋成為內海的歷史目標。然而，亞洲大陸上卻也出現百餘年來最強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在強勢美國的壓力下，歐亞大陸上的中、俄兩強卻也難得出現近半世紀的友好合作關係，為百餘年來亞太地區海陸爭霸的歷史更增動盪。

3.2 以中共為主大陸勢力的統一戰線

歷史的中國本質上就是一陸權國家，海洋幾乎從來就不是中國政經發展的重心；直至近代，來自海洋的「歐風西雨」才迫使中國正視海洋勢力的威脅與挑戰。然而，從清末到中共建政的毛澤東時期，中國的戰略格局依然未能跳脫亞洲大陸的侷限。「四人幫」之後鄧小平從一九七九年起推動的改革開放路線，終於使中國逐步邁進海洋世界。歷經近十年的改革開放後，一九八八年的「河殤」終於直率地指出：古老的大陸國家－中國，必須走入海洋世界，汲取海洋文明的優點，才能為已衰弱的中國文明注入新的活力。當中共決定採行東出太平洋的戰略佈局後，「中國威脅論」從一九九〇年代起，就如同黃河大水般地注入亞太地區的權力漩渦中，在亞太捲起新一波海陸勢力爭霸的浪潮。

中共打贏「國共內戰」後曾試圖從朝鮮半島進入亞太地區海洋勢力的版圖，但在美國假「杜魯門主義」所建構海洋圍堵線的阻擋下，中共在毛澤東的「鎖國政策」下基本上並無體系完備的東亞或亞太政策。即使，從毛澤東所謂「一大片、一條線、三個世界」國際戰略的佈局而言，中共雖企圖在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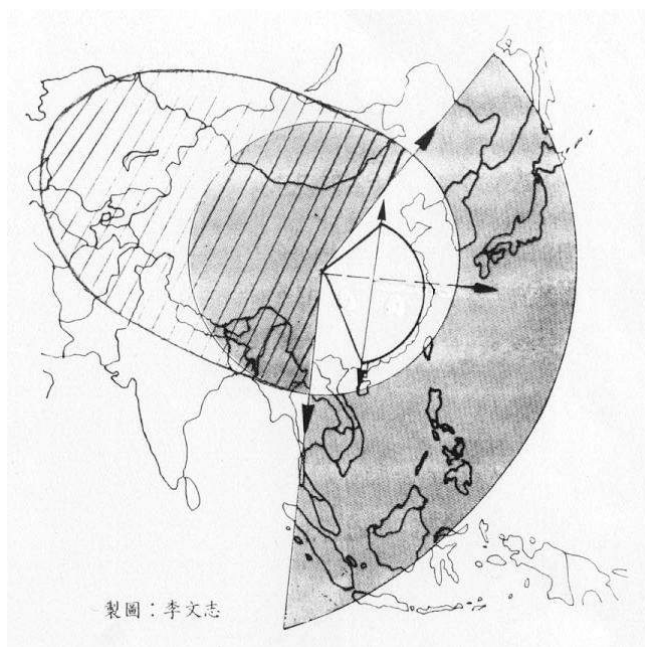
蘇兩大集團之外另建勢力範圍，包括拉攏「第二世界」的日本及屬於「一大片」中的東南亞等「第三世界」，但以中共的國力及實際作為來看，其不僅無法撼動全球性的美蘇兩極體系，對亞太區域戰略形勢的影響也端視於其在美蘇對抗中的籌碼而定。直至一九八〇年代中共在「鄧小平路線」下，才逐漸走出美蘇對抗的狹縫，並在改革開放的經濟成效上日益增強對亞太戰略形勢的影響力。

「富國強兵」一直是中共首要的建國目標，只是在毛澤東採取鎖國式經濟民族主義的發展策略下，不僅未能「超英趕美」，還因農工兩元結構矛盾的惡化而使中共經濟瀕臨破產。（鄭竹園，1980：23-24；王建，1993：3-4）一九七九年的「懲越戰爭」更讓中共深刻認知國力的衰敗。鄧小平上臺後所推動的改革開放就在打破鎖國式的發展策略，希望藉由外資的引入來增進民族資本的積累；而就一九八〇年代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亞太地區蓬勃發展的經濟正好成為中共挹注「四個現代化」的最佳源泉。中共從一九八〇年開放沿海四個特區到一九八八年的「國際大循環」發展策略，說明其企圖藉由亞太經濟來帶動中國沿海地區的全面發展，進而再以沿海的經濟帶動內陸地區的發展，建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內騰昭，1992：31-33；樊勇明，1992：12-18）亞太地區海洋國家的優勢經濟成為拉動中共經改的重要動力。

配合走入海洋的經改路線，中共也逐步調整以往為因應冷戰的內陸發展政策與大陸戰略。首先，中共在一九八六年提出結合沿海經濟發展帶與開發上海浦東—長江流域的「T形」—「弓箭形」發展策略，參見圖二，取代一九六〇至七〇年代為對付蘇聯而強化內陸地區發展的「三線建設」（即內陸、中間與沿海三線的區域發展規劃）；另外，中共軍方為能對面向海洋的經改提供「保駕護航」，除陸續裁撤百萬陸軍及昆明、武漢與新疆等內陸軍區，也在一九八九年將過去誘敵深入再殲滅的「近岸防衛」戰略，改為在海上就將來敵殲滅的「近海積極防衛」戰略。（李文志，1996a：132-134）從亞太戰略形勢的發展來看，中共面向海洋之「弓箭形」發展策略對外輻射的扇面，正好涵蓋亞太週邊經濟較發達的海洋國家，而且，這一弧形的扇面正好與美

國「西進」太平洋所部署的「列島戰略」—海洋戰略線重疊。這意味亟欲「東出」太平洋的中共勢將牽動亞太地區海陸國家既有的權力平衡，尤其是，衝擊美、日海洋強權在此區域既有的權力地位。冷戰結束後，中共即因經改成效取代蘇聯成爲亞洲大陸的新興強權，「中國威脅論」也隨著中共海洋戰略的佈局而爲冷戰後亞太地區海陸爭霸的新戲碼。

圖二、中共「弓箭形」—海陸戰略示意圖（作者自繪）



其次，中共繼一九九二年初以鄧小平南巡啓動的「二次經改」，化解因「六四事件」所引發內部改革路線的爭議與國際外交的困境，而再度強化以海洋資本主義帶動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線後。中共更在九二年稍後通過「領海暨毗連區法」，將臺灣、中沙群島、東沙群島及具領土爭議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及釣魚台均列入疆域範圍，賦予中共海軍以武力介入周邊海洋區域的法源，正式從法理上合理化中共海權的擴張；當然，這也引發中共與周邊海洋國家，包括臺灣和涉及島嶼主權爭議之相關國家日益緊張的關係，尤其是，必將與長期以來主導這些海洋國家政經發展的美國正面交鋒。（平松茂

雄，1993：49-51）中共乃積極改變軍力結構以逐霸海權，以一九九四年為例，人民解放軍主要軍備採購金額中，海、空軍的總額估計即為陸軍的十五倍之多；而且，也陸續在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向俄羅斯採購二十六架具有強大攻擊性的蘇愷二十七型戰鬥機（SU-27/UBK）、877/636型「基洛」級潛艦，一九九七年購入現代級導彈驅逐艦，以及一九九九年購入蘇愷三十型戰鬥機（SU-30MK）等，並預計在二〇〇五年擁有數艘具實際戰力的輕型航空母艦，以及企圖在二〇一〇年發展完成遠洋艦隊，成爲一個具備強大海軍與遠洋作戰能力的海權國家。（張雅君，1998：9；李文志、蕭全政，2000：13）

在整軍經武之際，中共也同時在海陸兩端建構「多層次的統一戰線」，一方面是藉由擴大其在歐亞大陸上的戰略縱深，鞏固其作爲當前亞洲陸塊上唯一強權的地位，增加與美、日海洋強國競逐海權的籌碼；另一方面，則透過與周邊海洋國家間聯合與衝突的關係，從中拉出中共勢力得以擴張的戰略空間。首先是在海洋戰線方面，中共於一九九三年「十四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提出「三個三角」的戰略，其意含是假大、中、小三個不同層次「三角關係」所架構之「多層次統一戰線」，鋪陳其逐鹿亞太海權的戰略陣勢。其中，「大三角」是指經營中共與美國、日本關係；「中三角」則爲拉攏中共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東南亞國家的關係；「小三角」則是完成中共與香港及臺灣的統一；而整體戰略的進程就是掌握「小三角」、爭取「中三角」，進而周旋於「大三角」與美、日競逐亞太的海權。（李文志，1996a：129-138）從戰略的高度鳥瞰，中共「三個三角」的戰略，不論就經濟發展策略或地緣政治的觀點，的確具有統合中共邁向海洋國家—掌握海權的戰略企圖。

從中共「多層次統一戰線」的佈局來看，「第一層統一戰線」是爲解決臺灣與香港的問題。對中共而言，其與臺灣和香港的地位及關係，不僅是經濟發展問題，更涉及中國統一的民族大業，以及能否在二十一世紀完整掌握亞太地區的航海線，特別是所謂「第一島鍊」（即由白令海峽沿日本、臺灣到菲律賓群島以內的海域）區域內航線的關鍵。中共企圖掌控這一區域內的航線，尤其是涉及日本「周邊」區域的航線，也正是促成一九九六年美、日

簽訂新安保條約重要原因。其次，在建立「第二層統一戰線」的策略上，中共分別從加強經濟整合與「睦鄰外交」的途徑，界定其與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利害關係及地緣屬性，以便在立場上區隔出東亞國家與美、日兩國家的差異。在經濟方面，中共有意利用沿海的經濟發展強化與鄰近周邊國家「自然經濟圈」（natural economic territories, NET）的「共生」關係，而在亞太海、陸交界地區形成諸如「環日本海經濟圈」、「黃海－渤海經濟圈」、「華南經濟圈」與「西南－泰銖經濟圈」等次級經濟圈。另外，中共也利用「東亞金融風暴」的機會，藉機擴張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中共不僅在風暴期間維持人民幣的幣值也間接穩定港元匯率，不同於日本讓日圓貶值而直接擠壓其他亞太國家的出口；而且，中共也直接撥款無償援助東南亞國家，不同於日本是以低率貸款或須購買日本貨品為貸款條件的援助政策。（吳德鳳，2000：160-172）

至於在「睦鄰外交」方面，中共為破除「中國威脅論」而於一九九五年四月首度同意與東協召開「杭州會議」進行雙邊對話，以消除中共與菲律賓因「美濟礁事件」而引發的緊張關係。同年七月，在第二屆東協區域論壇中，中共更是針對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對東協作出多項妥協，包括改變過去只與個別東協國家舉行「雙邊」會談的立場，同意與東協進行集體的協商；而且，不再堅持過去片面處理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的方式，以及宣稱將依照國際法、聯合國海洋公約及相關法律規定，妥善解決南中國海的爭議，並願意維護南中國海域航道的通暢與安全，不過，必須排除美、日等非南中國海國家介入群島主權的爭端。中共選在東協亟欲提升東協區域論壇在亞太多邊安全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之際，提出符合東協立場及排除美、日介入南中國海爭議的主張，明顯是為建立其與東協「中三角」的統一戰線。中共對東協的影響力更展現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之「東協加三－中共、南韓與日本」非正式高峰會中地位的提升；在二〇〇〇年十一月的第三屆高峰會中，中共即主動提議將「東協加三」正式化為「東亞論壇」，以及建議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或與東協共組「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時報，2000/11/26：3；陳鴻瑜，

2000)。中共此舉在藉拉攏東協來強化其在亞太政經體系中的主導性地位，以排擠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領導地位及增加與美國折衝的籌碼。

相對於海洋戰線的部署，中共從冷戰後即在歐亞大陸上積極整備新的統一戰線；其中，尤以中共和俄羅斯關係的發展對中共逐霸亞太最具關鍵性的影響。從一九六〇年代以來，蘇聯一直是中共在亞洲大陸上的最大威脅，直至戈巴契夫上臺後，雙方的關係才逐漸走向和解；特別是，葉爾欽之後的俄羅斯與中共關係的進展更是快速，甚至成為中共在地緣政治上能走向海洋的最大憑藉。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俄在北京簽署的聯合聲明中，明定雙方不得參加任何針對對方的軍事政治同盟；一九九四年九月雙方在莫斯科所發布的聯合聲明中，表明不將本國核武器瞄準對方，而且繼一九九一年的東段國界協定又達成西段國界協定，並將雙邊關係提升為「建設性夥伴關係」，除消弭引發雙方緊張的爭議也解決彼此沉重的邊界國防負擔；一九九六年四月中、俄又將雙方的關係進一步提升為「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稍後，兩國又與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在上海舉行「五國高峰會」，簽署邊界協議及在邊界地區加強軍事互信措施與裁軍協議，化解中亞回教勢力與中共新疆少數民族的串聯及邊界的糾紛（上海五國高峰會在二〇〇一年六月會後，決議讓烏茲別克加入並改為「上海合作組織」）；一九九七年六月雙方更簽訂「中俄元首定期會議協定」，讓中、俄關係正式邁入元首定期互動的層次。（李登科，1999）

中、俄關係在美國建構「一超多強」的霸權基礎上持續增強，尤其是在俄羅斯總統普丁上任後，歐亞大陸上的兩強在阻止美國將世界權力「一極化」的前提下合作的空間更為擴大。俄羅斯在普丁代理總統時就在二〇〇〇年一月六日批准「俄羅斯聯邦新軍事綱領」，將首先使用核武器門檻大幅降低及把對抗美國的戰略目標明文化（Russian Federation, 2000）；稍後，中共國防部長隨即率團訪問莫斯科，商討如何擴大及深化彼此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並簽署「關於進一步加強軍事領域合作的備忘錄」。（石碌，2000a）從蘇聯解體後，中共在經改成效的支撐下已成為俄羅斯先進武器的最大採購

者，從戰機（蘇愷 27 和蘇愷 30）、潛艇（基洛級）、驅逐艦（現代級）、空對空飛彈（AA9/AA10）、地對空飛彈（S300/S400）、戰鬥直昇機（MI17）到戰車（T80/T90）等不一而足；而且，雙方也針對美國有意在亞太地區部署 TMD 系統，曾多次表明將導致中、俄更趨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甚至交流反飛彈技術及共同研發「歐亞飛彈防禦系統」以茲抗衡。（中國時報，2000/7/14：14）從海陸爭霸的戰略形勢來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進展與深化，就是歐亞大陸上主要勢力為反制美國稱霸世界所建立的統一戰線。中、俄雙方在二〇〇一年七月所簽訂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第九條更明言「如出現締約一方認為會威脅和平、破壞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針對締約一方的侵略威脅情況時，締約雙方為消除所出現的威脅，將立即進行接觸與磋商」。（中國時報，2001/7/20：11）基本上，此一條文的精神搭配其他增加雙方政軍合作條文的內容，幾乎明示中、俄間已形成準軍事聯盟的關係；當然，這一聯盟關係雖未言明針對美國，但從全球與亞太戰略形勢的發展來看，美國無疑是中、俄雙方主要防範的對象。

綜合中共在海陸兩端所佈局的戰線，中共逐霸亞太海權的戰略就是在強化與亞太海洋國家中較弱勢者的「共生」關係，以弱—分化美國在亞太長期經營之海洋戰略線的同時，也積極串聯俄羅斯以建構歐亞大陸上的反美勢力，而在地緣政治上拉出更多與美國折衝的籌碼及空間。而且，為徹底吸納以美國為主海洋勢力「和平演變」的壓力，中共更將其海陸戰略的佈局與內部區域發展規劃整合，呈現一極具發展與侵略性的總體戰略。就圖二「弓箭形」戰略所蘊含的進程與動線而言，中共為蓄積逐霸海洋與主導歐亞大陸的能量，以長江三峽建壩及開發大西部（持續藉大進大出引入外資以增長經濟）來拉大「弓箭形」戰略中的「弦」及增強「箭頭」—上海（浦東）的經濟力，讓中共能在提升及均衡（沿海與內陸區域）國民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同時，擴大對周邊海洋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而瓦解所謂的「海洋圍堵線」，甚至以經濟的「共生」將其整編為中共「東出」太平洋與美國較勁的鋒線。中共在二〇〇〇年底提議的「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及二〇〇一年二月在海南島召開

以亞洲國家為主體的「博鰲亞洲論壇」，皆是中共假經濟力積極編排亞太新陣勢的戰略佈局（李文志、蕭全政，2000：23）。此外，涵蓋中共西半部的「弦」若真能啟動大西部的發展，將可使中共在優勢經濟的基礎上有效影響中亞的局勢，以及增加中共在其與俄羅斯漫長邊界的主控權，而更強化中共對歐亞大陸統一戰線的掌握。

總體而言，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就是先藉由海洋國家的經濟力來發展經濟，再以經濟發展來增強武力並牽制周邊的海洋國家，然後，又透過經濟與軍事力量的交互運用分別界定其與相關國家的關係，而在海陸兩端開展出不同層次的統一戰線。其實，從中國傳統的世界觀來看，周邊國家本來就是中國的「藩屬」—隸屬於中國的勢力範圍並與「朝貢」關係界定彼此。依此觀之，中共出海並主導周邊國家事務只是在恢復歷史上中國的地位與勢力範圍，故南中國海域當然是「歷史水域」；而美國企圖將太平洋變成「內海」的戰略，在中共國力興起之際必然引發新一波的海陸爭霸。

四、亞太地區潛在軍事衝突的發展與挑戰

就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而言，亞太地區目前最可能爆發戰事的區域主要是：位於區域北部的朝鮮半島問題；中介地區的臺灣海峽軍事衝突；區域南方的南中國海主權爭議。這三個分布在亞太各次區域的潛在軍事衝突，不僅因被深鉗在亞太地區海陸爭霸的戰略結構中，而且，因個別衝突所涉及的利害關係不同，牽動亞太戰略局勢發展的影響也不同，發生的原因亦牽涉到各自複雜的歷史情仇，使其一時之間難以透過現存的亞太安全保障體制來處理，而更增問題的複雜與急迫性。

4.1 朝鮮半島的衝突

從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以來，朝鮮半島就被鑲鉗在美、蘇冷戰兩極體系

裏，而且，因地緣結構的關係，中共對朝鮮半島情勢的發展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冷戰時代南、北韓對峙的朝鮮半島就在美、蘇、中三角關係的制約下呈現緊繃而難以鬆動的局勢。隨著冷戰的結束，朝鮮半島的緊張關係也漸次鬆解，而對朝鮮半島局勢具影響力的主要強權，也因蘇聯的解體及俄羅斯經濟的衰敗，從美、日、蘇、中共轉為美、日與中共海陸強權，讓冷戰後的南北韓關係也深受海陸爭霸形勢的牽制。從一九九〇年到一九九二年初，南、北韓共開過六次總理會議，並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十九日簽署「南、北之間關於和解、互不侵犯、交流、合作協定」。然而，雙方關係的進展卻因一九九四年北韓領導人金日成的猝逝而暫告停滯；續任的金正日因著手於內部政權的鞏固而無暇於推進南、北韓的關係，朝鮮半島的情勢也因而陷入渾沌不明。美國雖從一九九四年即在「架構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下企圖透過經濟援助方式，包括免費的食物、油料及協助北韓興建「輕水反應爐」的核電廠以換取北韓停止發展核武及對外輸出飛彈；但是，美國在朝鮮半島上的進展卻非常有限。一九九六年美國企圖透過「二加二」—南、北韓與美國及中共的會談模式，直接由影響朝鮮半島局勢的四方會商解決南、北韓的問題。

美國亟於在冷戰後處理朝鮮半島問題的主要目的，在化解北韓發展核武所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對美國而言，北韓若真擁有核武則日本和南韓極可能也被迫發展核武，如此一來，美國在東北亞地區藉由核武體制掌控的領導地位將受到削弱；而且，美國也將因歐亞大陸上再加一親中共的核武國家而更難掌控歐亞大陸。更何況，北韓極可能為取得中東的石油而以核武器或飛彈技術和中東的反美國家交換，一旦主要的反美國家在石油與核武器上建立共同陣線，則美國將難以完全掌控中東石油區的局勢與全球的核武秩序，這將直接衝擊當前由美國霸權所主導全球政經體制。(Mandelbaum, 1995: 164-166; Gong, 1995: 15-16)

美國所提議的「二加二」會談顯然無法獲得其他當事者的配合；尤其是中共，這除因一旦北韓屈服於美國，則中共將失去一個牽制美國的重要籌碼，而且，美國在亞太的地緣勢力也將直接拉到中共的邊境，中共也將成為美國

口中在東亞地區僅剩的社會主義「惡棍國家」(rogue state)。此外，南韓也因美國的強力主導而未能在朝鮮半島上擁有太多的自主權，特別是在許多涉及南韓利益的問題上，北韓竟可以越過南韓直接與美國接觸談判，更使南韓覺得雙方在北韓問題的互信基礎受到傷害；影響所及，南韓也試圖在與北韓問題上走出自己的政策，稍後，新任的南韓總統金大中即提出著名的「陽光政策」。美國的北韓政策在無法獲得其他國家的充分配合下，北韓的「非核化」與放棄飛彈技術發展當然也都無法取得有效的進展。一九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北韓試射一枚中程導彈飛彈「大浦洞一號」，這枚飛彈的第一節落在俄羅斯與日本之間的海域，第二節則越過日本東北部，落在距離日本本州數百公里外的太平洋。同年九月四日，北韓中央通信社更宣佈該國已於八月三十一日成功發射第一枚衛星進入地球軌道。這不僅意謂北韓已擁有發射長程彈道飛彈的能力，也顯示美國長期以來企圖掌握北韓核武與飛彈發展政策的挫敗。

北韓向來採取自我孤立的鎖國政策，導致其他國家對其決策的真正動機難以掌握，特別是，當北韓採取「戰爭邊緣」的挑釁動作時，更引發周邊國家的疑慮。一九九八年的北韓飛彈試射，顯然已對美國、日本及南韓等國家造成衝擊，並為亞太地區的安全投下更多的變數。(朱松柏，2000：1-2) 北韓成功試射人造衛星—長程彈道飛彈的能力，使其成為第一個有能力以長程飛彈裝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攻擊美國的第三世界國家。所以，當北韓成功的將飛彈越過日本上空時，柯林頓政府即指派前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Perry)，擔任全面檢討美國與北韓關係工作的領導人，裴利並於一九九九年五月以美國特使的身分訪問平壤，回國後於九月十五日提出名為「北韓政策五點建議書」的「裴利報告」。(朱松柏，2000：6) 在裴利提出報告前夕，美國與北韓就飛彈問題在柏林進行的會談也達成臨時協議，北韓將以凍結其長程飛彈計畫，換取美國承諾取消對北韓的經濟制裁，並拓展雙方之間的新關係。「柏林協議」雖暫緩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但也留給北韓日後在此進行飛彈要脅的空間，因為「柏林協議」只是暫時凍結北韓的飛彈試射，並未

完全限制北韓未來飛彈的研究與發展。

對於美國和北韓就飛彈問題所達成的初步協議，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雖表示歡迎，但對是否解除一九九八年八月底因北韓試射飛彈而實施的凍結糧援措施，則表示在確定北韓是否真正凍結發射飛彈前，日本將暫緩停止凍結措施（中國時報，1999/9/14*）。而日本防衛廳長官野呂田芳成也說，「北韓凍結發射飛彈計畫絕對不是事實」，並強調日本將計畫加強採購空中加油機和其他裝備以強化日本的空中防衛能力。（中國時報，1999/9/15*—參中時電子報「兩韓高峰會」新聞專輯）日本對北韓的不信任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北韓試射的飛彈是先飛過日本的領空才進入太平洋。對日本而言，一旦北韓擁有核武，日本的鄰國中就有美、俄、中共及北韓等國都擁有核武，那意味日本幾乎被核武國家包圍。因此，日本在北韓「飛彈試射事件」後，對原先採保留立場的 TMD 計畫也改以積極的態度。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日、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行的「外交暨國防部長及安保會議」中，日本防衛廳長官額賀福志郎就表明同意參加由美國主導 TMD 的共同技術研究，以構築日本的反飛彈系統。

對南韓而言，其主要威脅無疑是來自北韓，而且其外交政策與安全措施皆以美國馬首是瞻，在美韓共同防衛體系的架構下，南韓的軍事戰略與三軍任務完全以圍堵北韓的軍事挑釁與武裝為主要目的（朱松柏，2000：9）。然而，一九九八年八月的北韓飛彈試射，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危機，包括美國的 TMD 計畫，卻顯然促使南韓總統金大中面臨重大的考驗，即南韓究竟是延續著冷戰機結構而加入美國的新冷戰或拒絕加入，金大中的選擇是後者，一九九九年的八月，南韓正式宣佈拒絕加入美國的 TMD 計畫，這是南韓的重大歷史抉擇，揭櫫走出舊冷戰結構的政策路線，也為往後美國與南韓的關係埋下變數。（中國時報，2000/6/19*）

鑑於北韓的飛彈試射及核武發展威脅，南韓希望透過和平的方式來改善南、北韓的關係。二〇〇〇年三月十日，金大中在訪問柏林時提出「新低盪」與「大談判」的概念，在向北韓發出高峰會籲求的同時，也向北韓保證將協

助維護北韓安全、並提供經濟合作與援助，及協助北韓進入國際貨幣基金與亞洲開發銀行，讓北韓得以取得國際的開發資金與市場，解決北韓日益惡化的糧荒問題與經濟困境。金大中的呼籲，因相較一九九九年八月拒絕加入美國的 TMD 計畫更具善意，而牽動出連串的反應，南、北韓雙方即藉著北京的管道，接連舉行至少三次以上的秘密會談（中國時報，2000/6/19*）。金大中的「陽光政策」終於在朝鮮半島綻放，二〇〇〇年四月十日，南、北韓同時宣佈於同年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舉行歷來首次領袖高峰會。此次會談乃是北韓領導人金正日主動回應南韓總統金大中的「柏林宣言」，顯示北韓過去所採取的「通美封韓」政策將轉向「借道南韓，走向世界」。對美國而言，南、北韓透過中共在雙邊關係上取得重大的進展，無疑是對其朝鮮半島政策的重大挫敗，甚至可能衝擊長期在亞太地區所建構海洋戰略線的完整性；當然，這也將使美國更加倚重美日安保體制，對日本而言，這似乎也是其在亞太棋局中必然的走步。相對地，中共則因地緣與歷史的因素在朝鮮半島的問題上取得較美國更大的影響力，從而使其在與美國所進行海陸爭霸中將大陸的統一戰線向前推進一大步。

4.2 臺灣海峽的衝突

自冷戰在亞太地區開幕以來，臺灣海峽兩岸的政軍衝突就是一典型海陸爭霸形勢下的產物。從韓戰爆發美國改變先前發表「中國白皮書」（China White Paper）的對華立場，而將國民政府主控的臺灣納入「杜魯門主義」的海洋圍堵體系後，整個冷戰時期，臺灣的外交處境與臺灣與中共的關係就深陷於美國亞太與中國政策的制約。直至冷戰末期，臺海兩岸關係在全球性和解潮流下也終有較大的進展。自一九八七年臺灣開放大陸探親後，海峽兩岸四十幾年隔絕的關係正式結束，雙方並於一九九一年起，逐漸建立制度性的溝通與協商管道，在一九九三年也舉行首次高層的「辜汪會談」。此後，雙邊的經貿與文教交流即迅速擴大，甚至從一九九四年起（依臺灣海關統計），

中國大陸還超過美國成爲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然而，海峽兩岸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對峙狀態，並未隨著臺灣於一九九一年宣告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而結束。中共始終不願放棄以武力的方式來達成兩岸統一，是造成臺海潛在軍事衝突的主要因素。一九九五年六月李登輝總統訪美後，中共不僅片面停止雙方逐步搭建起的溝通與協商管道，更於同年七月在臺灣北部海域一百六十海浬處進行導彈試射，將臺灣海峽鄰近區域直接帶入戰爭的邊緣。尤其，一九九六年在臺灣首度舉行的總統直選前夕，中共更透過大規模軍事演習的方式，意圖影響臺灣的總統大選。

中共「不承諾不對臺灣使用武力」，除民族主義的因素外，主要還有內、外兩大國家安全層次的考量。首先是中共爲避免激發其內部蓄勢待發的分離主義。中共憂慮一旦臺灣脫離中國大陸而獨立將引發骨牌效應，潛藏其內部的種族衝突與分離運動，如西藏獨立、新疆的回民獨立、內、外蒙古合併與東北朝鮮民族統一問題，勢必因而被激發而可能失去控制。所以，中共特別聲明「保留」對臺灣使用武力達成統一的權力，除對外表明其將不惜任何代價維護政權與領土的統一，也具有對內警示分離主義運動的意義。其次是中共爲取得主導亞太地緣戰略的優勢。臺灣位於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一方面是折衝海權國家與陸權國家利益的重要據點之一；另一方面，又是掌控亞太區域南、北交通航線的樞紐，亦即臺灣的戰略歸屬，將直接影響中共能否全盤掌控亞太的航線與戰略形勢。這將使中共無法將其積極策動的「海洋戰略」串聯起來，也將削弱其逐霸亞太海權的籌碼。甚至，中共還可能因亞太地區日漸盛行的「中國威脅論」，而再度陷入冷戰時代被以美國爲首之海洋國家圍堵的不利形勢。因此，中共堅持若臺灣宣佈獨立與外力－特別是所謂美、日海洋勢力介入臺灣問題時，必將以武力達成兩岸統一。

儘管北京與臺北都宣稱致力於尋求和平解決統一議題。但兩岸關係因爲中共不願放棄使用武力，導致雙方在冷戰後又因「國防現代化」與「二代兵力整建」的需求，進行新一波的武器競賽，升高臺海潛在衝突對區域安全的威脅。傳統上，中共的防衛策略與武力計畫都以維持一個大型武力結構，以

應付大規模的國內、外軍事任務為優先順序；不過，這項傳統在受到美國於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作戰模式的影響，使得中共從一九九二年即開始籌畫建構一個能運用高科技的快速反應－打擊部隊，以小型、快速、精準的三軍統合作戰方式作為建軍新方向。近年來，隨著中共國防重心轉移到東南部海洋區域，特別是，臺灣海峽與南中國海可能爆發軍事衝突的地區，中共的國防武力結構也轉向強調機動性與增大作戰半徑的海空軍與飛彈部署。

根據美國國防部在一九九九年針對臺海安全情勢所作的評估報告表示，雖然臺灣的飛彈防禦及防空系統將有所改善，但在二〇〇五年以前，中共解放軍將具有對臺灣發動空中及飛彈攻擊的能力，而二〇〇五年時，中共更將部署兩種短程彈道飛彈以及第一代地面攻擊的巡弋飛彈，這些武器將瞄準臺灣關鍵性的軍事設施，如主要機場、指揮、控制、通訊、電腦和情報站，以及經濟基礎建設，使臺灣應戰能力大受影響。（中國時報，2000/11/8：14）。面對中共日益增強的跨海作戰能力，美國除依「臺灣關係法」售予臺灣傳統的防禦性武器外，也試圖把臺灣納入其在亞太地區所部署 TMD 系統內。對中共而言，把臺灣納入由美國主導並以防禦中共飛彈為主的 TMD，除將導致中共喪失對臺灣的飛彈戰術的優勢外，更意味美國與臺灣進行實質的軍事結盟關係，以軍事性的海洋聯盟體系對中共實施圍堵。因此，中共不僅對美國有意協助臺灣發展飛彈防禦系統提出嚴厲批評，並積極在臺灣海峽對岸增加戰術飛彈的部署數量，企圖以絕對優勢的數量突破 TMD；據估計中共在台海對岸部署的飛彈數量，將會從一九九六年的五〇枚增加到二〇〇五年六五〇枚。（中國時報，2000/11/8：14）。

依亞太地區經濟整合與軍備發展的程度看來，臺灣海峽爆發戰爭的影響將是整體而全面的，幾乎沒有任何亞太國家得以倖免，特別是，將對區域經貿與交通產生重大的衝擊。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對亞太南、北航線依賴甚深的美、日兩大海洋國家，而其他日益倚重兩岸經濟發展與此一海空航線的國家，如澳、紐、加、東協與南韓等國也將受到相當的影響。面對中共可能以武力強行統一的激烈做法，臺灣海峽一旦發生戰爭，勢必破壞亞太地區海、

陸權國家間微妙的權力平衡關係，甚而引發區域內更大規模的軍事衝突，重創兩岸與亞太區域政經的發展。因此，如何避免臺灣海峽爆發軍事衝突就成爲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的重要課題之一。

4.3 南中國海的衝突

一九八八年中共與越南因赤瓜礁主權所屬，爆發軍事衝突後，潛存在南中國海地區的島嶼主權爭議，就日漸成爲冷戰後亞太地區的新火藥庫。其實，從冷戰以來南中國海區域就因地緣政治、豐富的天然資源且據國際航路要衝，而成爲鄰近國家與區域外主要強權競逐利益的主要區域。表面上，南中國海問題是涉及相關國際法及有關國家間的主權爭議（Ian, 1998），但實質上，卻是牽涉區域內外國家間關於戰略佈局、資源佔有與航行安全等不同層面的利益攻防。

首先，就地緣戰略的佈局來看，南中國海正好位於亞太海陸戰略線交接的南沿區域，這一海域在冷戰時期就是以美國爲主海洋勢力圍堵亞洲大陸共產主義向外擴散的防線；冷戰後，南中國海不僅是新興陸上強權中共出海必經之路，也是美、日等海洋國家維護經濟發展與區域利益的重要通衢。

其次，以資源的蘊藏而言，南中國海地區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與各種海洋礦藏是區域內各國發展經濟重要的資源，而這也正是引發各國因領土歸屬爭議而爆發衝突的直接原因；尤其是，對中共此一龐大的經濟體，如何在國內油源不足而國際油源又幾乎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掌控的情況下，確保新能源的取得將攸關國家生存發展至鉅。

再就航線的重要性與安全來說，南中國海位於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地區是連結兩大海洋的重要海域，也是中東石油航線通往亞太的必經之路，而且，進一步將亞太與北美航線連結起來，南中國海域更是貫穿歐、亞及北美兩大主要航線的必經之地，即「泛太平洋－歐洲主航線」經麻六甲海峽、「泛太平洋－中東石油航線」經龍目海峽。這是美、日等海洋國家一再重申勢將確

保南中國海域航線通暢與安全的主要著眼。

面對如此複雜與日漸緊張的南中國海局勢，爭議各國無不積極提升軍力，並採取擴大佔領南海島嶼，來增加各國折衝南海紛爭的籌碼，而使南中國海問題在冷戰後成為亞太地區另一讓人憂心的火藥庫。從近年來涉及南中國海主權爭議相關國家軍力的發展來看，中共是所有爭議成員中最積極整備工事的國家。中共在呼籲各爭議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同時，除對南中國海宣示擁有全部的主權，也在一九八七年特別將海南島升格為省，作為其經營南中國海政策的前進基地，而且，在一九八八年赤瓜礁的軍事行動後，更積極在永暑礁與永興島興建可供千噸級戰艦停靠的港阜與飛機起降的跑道，特別是在中共引進蘇愷 27 及「基洛級」潛艇加大對南中國海的打擊領域後，中共相對於鄰近東南亞國家的武力優勢更見顯著。另外，中共也在一九九二年公佈「領海暨毗連區法」，並在與東協的對話機制中表明將依「國際法、聯合國海洋法與各項相關法律的規定與精神」，解決南中國海的主權爭議，而其中「各項相關法律」的意指就是中共國內法的「領海暨毗連區法」，表明中共以國內法處理南中國海域爭議的立場並未改變。（李文志，1996b：46；Kim, 1998: 379-381）

為解決南中國海問題，東協國家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在馬尼拉舉行的第二十五屆東協部長會議中，簽訂「東協南中國海宣言」（the 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呼籲相關各方以和平而非武力手段解決南中國海問題，多年來，「東協南中國海宣言」也成為東協國家處理南中國海爭議的準據。在此精神下，一九九六年七月的「東協後外長會議」支持制定一份南海地區行為準則的建議；這項建議在一九九八年底越南召開的第六屆東協高峰會中被認可，東協決議制定讓南中國海各爭議國都遵守的行為準則。一九九九年五月東協的「資深官員會議」正式提出「南中國海行為準則」（South China Sea Code of Conduct）草案，並分別於七月及十一月提至「東協外長會議」和非正式高峰會中討論；但草案內容因涉及是否涵蓋西沙群島及能否在爭議海域進行軍事演習與偵察等敏感性議題，而使得該行為準則在越南與菲

律賓，特別是中共的反對下依然未定案。（宋燕輝，2000：22-23）然而，面對中共日漸增強的軍力及強勢的主權訴求，東協國家似乎只有透過「集體議價」的方式與中共進行談判，才可能有較大的折衝空間。此外，東協國家近年也在既有美、日等國的勢力外，試圖引進印度勢力來平衡中共在南中國海地區日益增強的地位。（中國時報，2000/5/9：14）

依目前整體情勢的發展看來，南中國海問題的解決似乎仍停留在，各爭議國極力擴大籌碼以取得最大可能主導地位的階段。至於美國因在南中國海地區無直接介入的憑據，僅能提出宣示性的政策聲明，希望各爭議國能和平解決爭端，並維持南中國海航線的暢通與安全，以求取美國在該區域的最大利益。（Noer, 1996）美國繼一九九五年由國務院正式提出政策聲明後，多年來並無更明確與正式的政策聲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六日，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K. Albright）在第六屆東協區域論壇發言時，也僅能表示美國對南中國海緊張情勢之高度關切，並呼籲各相關國家應竭力尋求外交解決途徑、找出可行的信心建立措施，以採取具體行動協助穩定區域情勢，使爭端之和平解決成爲可能。

中共在亟於將南中國海變爲中國內海的基本戰略下，積極設法降低美國對南海的影響力。然而，美國雖已在一九九二年完全撤離菲律賓基地，但美國在新加坡仍保有在東南亞最大的後勤維修與補給的基地，而且，美國與菲律賓及泰國也仍保有雙邊軍事協防條約，在必要的時候美國都可藉機介入南中國海域的重大主權衝突；此外，爲確保南中國海域公海航行權與群島海域的「無害航行權」，美國仍可藉以干涉南中國海的軍事衝突。當然，美國近年與越南雙邊關係的改善，也讓外界產生美軍有可能在二〇〇四年越、俄租借協約期滿後重返金蘭灣的聯想。總之，身爲本區域最強海權的美國依然有許多籌碼介入及掌控南中國海戰略形勢的發展。

表一、南海爭端國島嶼有效占領統計表

國 家	西 沙 群 島	南 沙 群 島
-----	---------	---------

中 共	23	6
中華民國	0	1
馬來西亞	0	3
菲律賓	0	8
越南	0	20

Source of Data: Calculated from the data in Luu Van Loi, 1996, *The Sino-Vietnamese Difference on the Hoang Sa and Truong Sa Archipelagoes*: 117~120. Hanoi: The Gioi Publishers.

五、臺灣的亞太安全戰略—代結語

四百年前，臺灣因為靠近中國的地緣位置而受到世人的注意，從此開始了東西海權圍繞著臺灣而展開的互動，臺灣的歸屬就在每一次的互動最後上升到戰爭的階段之後被決定了：一六〇二年荷蘭人攻打葡萄牙人佔領澳門不果後，在一六〇四年進佔澎湖一三一天；一六二二年荷蘭人進攻澳門再遭失敗後，二度佔有澎湖兩年又一個月，經福建官兵與荷蘭人在澎湖決戰後，一六二四年荷蘭人改佔臺灣；一六六一年鄭成功從金門、廈門發兵大員，對荷蘭人發動長達九個月的作戰後，臺灣被納入漢人的社會；一六八三年清將施琅水師攻克澎湖，鄭克塽政權覆滅，臺灣進入了大清的版圖；一八九四年中日渤海海戰，清海軍瓦解，臺灣讓與日本；一九四五年中日二次大戰終結，臺灣又再度被納入中國版圖；一九四九代表西方不同利益的美蘇集團各自支持的國共勢力經過慘烈的內戰後，敗方退據臺灣，勝方隔海而治，明末鄭氏政權與清廷隔海對峙的歷史局面重演；一九五〇年韓戰爆發，中美開戰，美國海上武裝力量進入臺灣海峽，臺灣再度被納入西方的勢力範疇，五十年來，這種態勢基本保持不變。歷史似乎一再向我們顯示，從十七世紀開始的在東西海權的交戰互動中塑造臺灣歸屬的歷史宿命，到現在都還沒有完結。（湯錦台，2001：252-253）

綜觀一部四百年的臺灣史，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臺灣因位處亞洲大陸濱太平洋的中介位置，自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大航海年代以來，就是東西海陸霸權各方力量競逐的中繼站，臺灣的歸屬也就在強權攻防往來之間被決定。然而，歷史也告訴我們：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取決於，臺灣能否平衡地串

聯海洋與大陸勢力的利益，以及能否維繫亞太航線的通暢與安全。冷戰結束後，臺灣在美、中新一波的海陸爭霸中自當善用地緣位置的優勢與美、中間的競爭與合作，為臺灣拉開可進可退的戰略空間；而臺灣的策略則可分就總體戰略與雙邊關係的突破來構思。

首先，就總體戰略層次而言。從冷戰後國際政治與經濟漸趨整合的趨勢來看，權力平衡是「地緣政治」所發展出的重要戰略思考；經濟發展則是冷戰後「地緣經濟」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強調區域性的經濟整合與發展。從亞太地區特殊的海陸戰略結構來看，臺灣在亞太地區，由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結構所烘托的中介位置，使得臺灣在亞太戰略體系的地位，必須分別從這兩大結構來定位。（李文志，1996b：77-78）就亞太各國的利害關係而言，地緣政治中海陸爭霸所強調的是政軍權力的攻防與佈局，區域內的權力平衡是各國折衝的重點；地緣經濟重視的是技術、資金與市場利益的汲取與編排，區域內總體經濟的發展與經濟利益的擴張則是各國的目標，而這其間也隱含著極為複雜的海陸勢力的攻防。臺灣在亞太戰略體系中的地位，也必須從這樣的亞太政經系絡中來掌握。

以亞太地緣政治的態勢而言，臺灣不僅位於亞太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接觸的交鋒線上，同時也是這一鋒線上南、北交通網絡的中介點。這種特殊的結構位置使得臺灣戰略地位的歸屬，將直接牽動亞太地區權力結構與戰略形勢的發展。從美、日等海洋國家的立場來看，臺灣是海洋國家向亞洲大陸叩關的重要橋頭堡，也是貫穿亞太海洋貿易與安全航線的交通樞紐（chokepoint）。相對地，從另一方以中共為主之陸地國家來看，臺灣不僅是其走向海洋尋求經濟發展與合作重要的窗口，也是牽制海洋國家連線圍堵亞洲陸地主要的突破點。臺灣的戰略空間即源自海、陸霸權力量交會所激起的權力平衡處。因此，臺灣只有現實與持平地，分從海權與陸權國家的立場估量臺灣在其間相對的利害關係，才能完整掌握戰略的出路與限制。否則，任何片面地從海洋國家（如美、日等國）或大陸國家（如中共）的觀點，定位臺灣的戰略屬性與國家走向，都將因過大的立場偏差與思考盲點，而難以形

構出臺灣在亞太地區完整的戰略與世界觀。

臺灣在亞太地緣政治上居處由海洋與陸地、東南亞與東北亞，兩大地理板塊所構成之十字座標的控樞位置，使得臺灣在亞太戰略體制中擁有相當關鍵的地位，是任何區域性的強權企圖建構掌控亞太戰略體制時，所無法忽略的戰略要津。擁有如此特殊與重要的戰略位置，臺灣必須以具體與強硬的安全政策，如加強對有關海域與交通航線的管控及增強在南沙太平島的駐軍實力，明示亞太各國任何忽略臺灣角色的亞太多邊安全合作的構想，都將是不切實際的作法。換言之，臺灣應動態地在亞太地區海洋與陸地的戰略結構中，透過突顯臺灣戰略地位的自主性以因應瞬息萬變的現實挑戰，才能適時地拉開臺灣在亞太地緣政治上的戰略空間與迴旋的縱深。

其次，就亞太地緣經濟的內涵來看，臺灣「中介」的經濟地位可以從技術、資金與市場等面向來掌握（李文志、蕭全政，1991）。以技術位階而言，臺灣的產業結構正好位於亞太分工體系－不論是所謂「雁飛型經濟發展模式」或「傳動式經濟發展體系」中「承上啓下」的中介位置，而這一中介位置也正好切入亞太兩大勢力在產經分工體系中的銜接處。再以資金面來看，臺灣不僅擁有近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多年來更一直是亞太第二與全球第八大的對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資金的輸出國；而且，據估計臺灣外流到中國大陸整體的資金額度約有一千億美元，而流至東南亞的資金也約有四、五百億美元；此外，在東亞金融風暴後，臺灣也是亞太地區少數有能力對外提供援助資金的國家之一。另就市場利益，臺灣日愈龐大的進口市場，也使臺灣經常處於全球第十四或第十五大進口國的地位；當然，臺灣與中國大陸密切的產業分工與合作的關係，也使臺灣在進入－經營中國大陸市場上具有相當的比較優勢，這讓臺灣市場腹地的規模更形擴大，而這也正是臺灣能發展成爲亞太營運－全球運籌管理中心的最大籌碼。

在亞太地緣經濟的發展上，臺灣確實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成員與動力之一，而且，隨著亞太區域與全球經濟互動與整合的日趨密切，臺灣經濟地位的重要性更趨顯著，這可從臺灣在一九九九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連

帶造成美國與全球重要科技股市大跌得知；另外，臺灣與美國高科技產業密切聯結的關係，也是臺灣得以在東亞金融風暴中仍能維持出口暢順，免除金融風暴襲擊的重要產業依憑。臺灣如此豐沛的經濟力量與利益，將使其在亞太區域經濟發展與整合中扮演重要的催化角色；再加以，從亞太地區強調經濟發展、社會和諧與政權穩定的「綜合性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發展的趨勢來看，亞太地緣經濟的發展將是促成區域多邊安全體制與維繫區域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條件，（Dewitt, 1993: 5-10）而這無疑也將予臺灣參與亞太安全體系運作的重要籌碼。因此，臺灣必須進一步擴大其在亞太與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籌碼，增強臺灣在亞太地緣經濟發展趨勢中的重要性。基本上，「南向」、「亞太營運中心」及「全球運籌—管理中心」等政策和構想的提出即是順應此一經濟戰略形勢的發展，只是，相關政策能否順利推行端賴於兩岸政策的發展而定，而這正是臺灣當前推行亞太戰略最棘手也是最迫切需要解決的課題。

另外，就雙邊關係的突破與進展而言。中共無疑是當前威脅臺灣生存最劇的國家，也是臺灣發展對外關係在的最大阻力；然而，中國大陸日益擴大的市場與商機卻也是臺灣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大助力。其實，在有關如何使臺灣參與亞太區域政經事務的課題上，亞太各國的處境實與臺灣近似，都面臨中共極大的壓力。因此，臺灣應先採取主動積極的應對之策，然後，各國才可能依情況搭配臺灣，順勢化解中共打壓臺灣國際生存空間的做法。綜觀亞太當前海陸爭霸情勢的發展與各國的態度，臺灣化解「中共因素」參與亞太區域政經體制的做法，可分別鋪陳如下：

- 1、美國仍是臺灣當前最重要的安全支柱與經濟夥伴（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的連帶關係），也是亞太地區唯一有能力制衡中共的國家。臺灣為獲取美國更大的支持，除訴求於地緣政治上牽制中共的重要性外，更應特別強調臺灣在當代政治民主化的成就與意義，以及日愈擴大的經貿利益與機會—尤其是強化臺灣是進入中國大陸市場最重要的門戶地位，以提升臺灣在美國全球政經戰略中的價值，而這也正符合後冷戰時代美國所追求整合經濟發展（特別

是進入一掌控中國大陸市場)、民主人權與軍事優勢的安全觀。從臺灣今年對美軍事武器採購內容及陳總統過境美國的待遇，即可知臺灣在美、中海陸兩強逐霸中的戰略地位又再次提升，無疑，這也是臺灣當前亞太戰略部署最重要的一環。

2、中共是臺灣目前參與國際社會主要的阻力，特別是隨著中共申辦奧運成功及中共與臺灣都加入 WTO 後，臺灣面對的中共壓力將更形加大，故臺灣應持續與中共進行雙邊的和解，臺灣應避免過度地將雙方緊張的關係帶進國際社會，而讓兩岸關係成為臺灣開展外交空間的包袱；更何況，策略性地改善兩岸關係還可為臺灣拉大與美國折衝的籌碼，而且，中共日趨龐大的經濟力與內需市場也是臺灣借力發展經濟及深化全球市場經營的重要憑藉，如何讓臺灣成為中國市場與世界經濟接軌的重要樞紐是當前亟需解決的難題。

3、面對日趨強大的中共，日本與臺灣的利害關係將愈趨一致，身為亞太地區主要海洋國家的日本，對中共此一陸地霸權興起的憂慮未曾降低，「中國威脅論」相當程度反映日本的立場，而如何統合亞太海洋國家間的共同利益將是日本未來重要的政策 (Ichimura, 1995)。這意謂也是海洋國家的臺灣，在對日關係的突破上應有更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可順勢結合並落實原為日本所提出的「綜合性安全」，在增加雙方與其他海洋國家共同因應「中國威脅」的同時，更應進一步強化彼此 (臺灣與日本已有深厚的產業－廠商連帶的合作關係) 對中國大陸市場經濟利益的汲取，以擴大國外市場來走出當前的經濟泥淖，畢竟，中國大陸是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最新且最具潛力 (大) 的市場。

4、澳、紐、加與南韓等中權 (middle powers) 國家對臺灣將日漸重要，雖然這些中權國家無力改變亞太地區既有的權力平衡關係，但其作為緩衝海陸爭霸緊張與催化亞太多邊安全體制中介的角色將愈趨顯著。臺灣應積極強化與這些中權國家的關係，甚至是，設法將之串聯起來成為亞太地區在美國、東協與中共之外的「第四勢力」，以便讓他們在亞太功能體系中特殊的緩衝及中介的地位，能成為臺灣參與亞太多邊安全體制運作的助力，而這無疑是

臺灣長期努力的目標。

5、東協國家與臺灣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東協各國雖因地緣政治的壓力而難以擺脫中共的影響，但是，中共近年來對南中國海領土爭議的強勢作為，以及雙方對經濟資源—包括資金、技術與市場的競爭關係，無疑都予臺灣許多拓展和東協各國關係的機會。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安全問題上，臺灣應藉由突顯其在地緣政治上權力平衡的角色，主動創造臺灣參與亞太多邊安全合作體制的籌碼。在海陸爭霸的戰略態勢下，「南向」與「西進」政策如何和臺灣強化與美、歐及日本間的「北聯」政策作整體性的戰略搭配，在可見的未來仍是臺灣的重要策略。

總之，臺灣要在亞太海陸爭霸的戰略體系中謀求生存與發展，就必須先以自身的力量證明，臺灣是亞太戰略體系中的重要成員；而且，臺灣只有主動透過各種努力與嘗試，才能創造機會讓其他亞太國家協助臺灣打破中共的封鎖。臺灣這種「以發展來擴展生存」—主動創造籌碼與折衝空間的戰略，是臺灣在海陸爭霸體系中突破兩岸關係與經濟發展瓶頸的主要對策，也是臺灣順勢化解中共打壓的最佳憑藉。

參考書目

- Amer, Ramses. 1998. "Toward a Declaration on 'Navigational Rights' in the Sea-lanes of the Asia-Pacific."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 (1) (April): 88-102.
- Baker, James III. 1991.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70 (5) (Winter 1991/92): 1-18.
- Brzezinski, Zbigniew. 1997.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 Bush, George. 1991a. "Bush Seeks to Inspire Support for Persian Gulf Mission."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Weekly Report* February 6, 1991.
- . 1991b. "Remarks to the Asia Society in New York City." *Administration of George Bush* November 12, 1991.
- Castor, Renato Cruz De. 1998. "The Controversy in the Spratlys: Exploring the Limits to ASEAN's Engagement Policy." *Issue & Studies* 34 (9): 95-123.
- Christensen Thomas J. 1999.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Spring 1999): 49-80.
- Clinton, Bill. 1993. "Clinton: I'm Sending a Message of Asia's Importance." *AIT EPF* 205 (July 6, 1993).
- David Wilkinson. 1985. "Spykman and Geopolitics." *Ciro E. Zoppo & orgbibe ed., On Geopolitics: Classical and Nuclear: 77-118*. Dordrecht, Nether lands: Martinus Nijhoff.
- Dewitt, David B. 1993. "Concept of Security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ommon Security, Cooperative Securit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Seventh Asia-Pacific Roundtable: Confidence Building and Conflict Reduction in the Pacific*. Kuala Lumpur. 6-9 June, 1993.
- DoD (Department of Defense). 1995. "U.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DoD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1995.

- . 1998. *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 Fifield, Russell and G. Etzel Pearcy. 1944. "Evolution of Geopolitics." in *Geopolitics in Principle and Practice*. GINI AND COMPANY.
- Gaddis, John L. 1972. *The United Stat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one, Gerrt W. 1995. "U. 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pril 12~14.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Disarmament and research on Conflicts. Taipei.
- Gregor, A. James. 198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ecurity of East Asia*. A Strategic Study by the Asian Studies Center. The Claremont Institute.
- Harding, Harry.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eater China and What It Means for America." *National Committee China Policy Series* 10 (December 1994).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Ian, Townsend-Gault. 1998. "Preventive Diplomacy and Pro-Activ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 (2) (August, 1998): 171-191.
- Ichimura, Shinich. 1995. "Japanese Strategies in East Asia: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Pacific Collective Security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pril 12~14. The Institute for National Policy Research and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on Disarmament and Research on Conflicts. Taipei.
- Johnson, Chalmers and E.B Keehn. 1995. "The Pentagon's Ossifie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74 (4): 103-114.
- Kennan, George F. 1947.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566-582.

- Kim, Shee poon. 1998. "The South China Sea in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19 (4) (March, 1998): 369-387.
- Lord, Winston. 1993. "U.S. Is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the New Pacific Community." *AIT EPF* 508 (October 8, 1993).
- Luttwak, Edward N. 1990.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National Interest* 20 (Summer 1990): 17-23.
- Mandelbaum, Michael. 1995.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ategic Quadrangle." in Michael Mandelbaum, ed., *The Strategic Quadrangle*. New York: 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 Nore, John H. 1996. "Southeast Asian Chokepoints — Keeping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Ope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 of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http : //www.ndu.edu/inss/strforum/forum98.html](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forum98.html)
- Nye, Joseph S., Jr. 1995.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74 (4): 90-102.
- Paker, Geoffrey. 1998. *Geopolit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Biddles Ltd, Guildford and King's Lynn.
- Paul Kennedy, 1987.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P.441.
- Rand. 2000.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Rising China*.
- Rice Condoleezza. 2000. "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Jan / Feb 2000).
- Ross Robert S. 1999.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4) (Spring 1999): 81-118.
- Russian Federation. 2000.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ull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Rossiiskaya Gazeta, January 18, 2000.
- Scalapino, Robert A.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 Future Pro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19-40.

Spanier, J. 1985.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World War II*. Texas: The Dryden Press.

Sutter, Robert G..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anging East Asia Order: Implication for Taiwan's Ability to Deter Possible Treats from the Mainland*.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July 1991.

Taylor, Peter J. 1993. *Political Geography: World-Economy, Nation-State and Locality*. New York.

內藤昭（編）。1992。《中國 國際經濟戰略》。東京：同文館出版株式會社。

平松茂雄。1993。《中國 海洋戰略》。東京：勁草書房。

矢晉吹。1994。《圖說中國 經濟》。東京：蒼蒼社。

渡邊利夫。1992。《局部經濟圈時代》。東京：出版。

王建。1988。〈關於『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世界經濟」編輯部，《中國沿海地區外向形經濟發展戰略》：63-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王建。1993。《走向世界的中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時電子報。「兩韓高峰會」新聞專輯，網址：<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korea/main.htm>

中國時報。2000。《中國時報》2000/5/9：14。

中國時報。2000。《中國時報》2000/5/27：14。

中國時報。2000。《中國時報》2000/7/8：14。

中國時報。2000。《中國時報》2000/7/14：14。

中國時報。2000。《中國時報》2000/7/19：1。

中國時報。2000。《中國時報》2000/11/22：3。

中國時報。2001。《中國時報》2001/2/28：10。

中國時報。2001。《中國時報》2001/7/20：11。

- 石碇。2000a。〈俄『中』聯手對抗美國的新格局〉。《中央日報》2000/1/24，副刊號 75 期。
- 石碇。2000b。〈亞洲太平洋二〇二五年〉。《中央日報》2000/7/31，副刊號 101 期。
- 朱松柏。2000。〈北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39 (2)：1-11。
- 吳德鳳。2000。〈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影響之政治經濟分析〉。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 沈默。1979。《現在地緣政治：理論與實施》。臺北：三民書局。
- 宋燕輝。2000。〈東協與中共商議南海區域行為準則及對我可能之影響〉。《問題與研究》39 (4)。
- 李文志。1989。〈美援來華（一九四六—一九四八）之政治經濟分析—歷史結構的觀點〉。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1994。〈美國的亞太戰略—地緣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收錄於許介麟、蕭全政、李文志著《亞太經濟合作與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業強出版社。
- 。1996a。〈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收錄於蕭全政等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91-153。臺北：業強出版社。
- 。1996b。〈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臺灣的略的思考〉。收錄於蕭全政等著《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29-90。臺北：業強出版社。
- 。1997。《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臺北：憬藝出版社。
- 。1999。〈從文明衝突到大棋盤—冷戰後美國全球戰略思考的變遷〉。《暨大學報》3 (1)：369-376。
- 李文志、蕭全政。1991。〈臺灣的亞太戰略—南聯、西和、北進〉。收錄於許介麟等著《臺灣的亞太戰略》。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2000。〈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本文發表於「國科會東亞區域研究成果發表」研討會。2000年11月3-4日。臺北：中央研究院。

- 李登科。1999。〈五十年的『中』、美、蘇（俄）關係〉。《中國大陸研究》42 (10)：45-68。
- 林正義。1998。〈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際〉。臺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畫。
- 馬漢.艾.塞。1996。《海軍戰略》。茆鴻幹、田常吉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
- 許介麟。1991。〈臺灣的亞太戰略〉。收錄於許介麟等著《臺灣的亞太戰略》。臺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
- 張惠玲。2000。〈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共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39 (2)：51-65。
- 張雅君。1998。〈中共與美、日的亞太海權競爭：潛在衝突與制度性競爭機制〉。《中國大陸研究》41(5)：5-19。
- 陳鴻瑜。2000。〈中共倡組區域組織，衝擊東亞政經生態〉。《中國時報》2000/11/26：15。
- 湯錦台。2001。《前進福爾摩沙：十七世紀大航海年代的臺灣》。臺北：貓頭鷹出版社。
- 樊永明。1992。《中國的工業化與外國的直接投資》。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 鄭竹園。《中共經濟的診斷》。臺北：聯經出版社。
- 薩公強。1991。《中共十年經改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Under the Struggle of the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the Asia-Pacific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Taiwan's Security Strategy

Wen-Chih Le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general strategic pattern under the struggle of the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inside the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For its special geographic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situation is extremely influenced by the struggle of the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This study focuses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the change of power structure in Asia-Pacific region after the II world war. From the triangular relation of USA, USSR, and PRC to bilateral relation of USA and PRC, this research especially wants to examine how this relation shift influences Asia-Pacific geopolitics. On one hand, the USA's fan-spread strategy is to frame the ocean countries alliance in the rim of Asia Continent to become her deployed ba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USA global strategy attempts to divid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former USSR and PRC. Although these two countries had been opposed for their own strategic concern during cold war era, PRC has replaced Russia to be the main power in Asia Continent by its economic achievement and national strength building in post-cold war. Besides, PRC and Russia are likely to form the united frontline to match USA security strategy. The Asia-Pacific security setting after cold war has been shaped within the strategy arrangement of the USA and PRC. Compressed by the struggle of USA and PRC, other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Asia-Pacific countries either pick one side for individual national interest or turn between two sides to maximize profits. Certainly, the solutions of security problems in the controversial areas of Korea Peninsula, Taiwan Strait, and South China Sea are constrained by the two main powers. However, under the struggle of the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in Asia-Pacific, Taiwan has to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e position of middle-way in order to maximize interests.

Keywords: Geopolitics, Sea Power, Heartland, Rimland, the Fan-spread Strategy, Engagement, the Strategy of T, Three-Triangle-Strategy, Korea Peninsula, Taiwan Strait, South China Sea, Geo-economy, the Position of Middle-way